

文史資料

第一輯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一)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編

文史資料

第一輯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編

一九六一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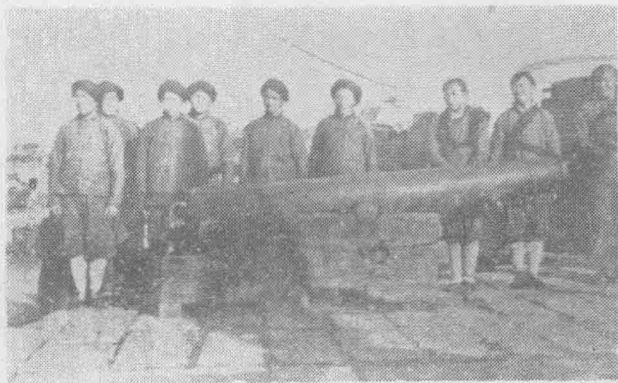
黄 兴



焦 达 峰



蔡 鐔



长沙光复时民军夺获清军大炮



长沙西园华兴会旧址

发 刊 詞

发动在旧社会具有丰富经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們，及时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及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書地写出来，傳給我們的后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湖南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往往成为各种力量（革命和反革命以及反革命的各个派系）斗争的焦点。从清朝末叶到解放以前，湖南经历过无数的大小事变，其中有一些具有全国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少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本省的范围。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是錯綜复杂而又丰富生动的。如何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演变和历史人物的活动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来，乃是年老一辈的人，特别是曾经亲历其事的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茶会上号召“具有丰富经历的老年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纪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决定編印《文史资料》这一不定期刊物，陆续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得的史料，进一步推动史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我們所征集的是历史資料，即作者根据他們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資料。因此要求內容必須真實具体。但撰写稿件的文字体裁，可不加限制。至于同一历史事件，几个人所述互有出入，除了由于記憶模糊而产生的明显的錯誤可以商量訂正外，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我們在征集稿件和編印集子当中都貫徹了这些原則。

为了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史資料》第一、二兩輯，都是选載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

当《文史資料》出版的时候，我們謹向撰写稿件的各位先生致以謝意；并希望各方面人士今后繼續踴躍投稿，共同努力来完成党所交給我們的光荣任务。

目 录

发 刊 詞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1)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李书成 (27)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章士釗 (66)
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周震麟 (80)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一欧 (93)
追忆蔡松坡先生	唐才質 (105)
辛亥湖南光复的片断回忆	閻幼甫 (109)
辛亥长沙光复的东鳞西爪	余 韶 (130)
辛亥革命见闻	荆嗣佑 (140)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穆如 (160)
谭心休招撫宝靖始末	李晴云 (167)
启蒙时期青年运动的急先锋——禹之谟	邓介松 (174)
关于鄒永成的二三事	鄒协勋 (184)
黄兴辛亥四月在香港致华侨同志書	(187)

附 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征集文史資料

参考題目	(192)
------	---------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繼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楊振鴻、罗佩金、殷承瓛、郑开文、唐繼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組織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紹，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謁見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藹可亲，与同志談，諄諄不倦。我請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貴利祿的觀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軍占領地区，必須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領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尙未竟，我插問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選擇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訕謔在胸，不假思索地說：

“革命必須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

而于敌不利，則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選擇革命基地，則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經濟中心，或为交通樞紐，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爭。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方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綰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蕩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須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則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傾向革命，攻占較易；并且港澳密通，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那里下手；不过从現時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較易为力。”

此外，他还講了許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經過，我都能有所領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誨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悅誠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轉入陆军士官学校，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調我和姜登选、舒和鈞、王凱成四人入川訓練新軍，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我們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謀，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帶。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詳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認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綱要，以为守則。当时拟定的行动綱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終不渝；二、稳步发展組織；三、切实把握軍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

切力量，共策进行。我們当时認為，只要这个綱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們可以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們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們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楊瑾、季雨霖、舒和鈞、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會議，討論行动綱要，得到一致同意，當場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一九〇九年二月的事。

那时协統是旗人鍾穎，我們对他很为警惕。到三月間，川督調他帶兵入藏，协統一职另調东三省道員朱庆瀾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鍾穎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調动軍隊与安排人員的問題。入藏軍隊約二千余人，編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編，管帶陈庆；二、三两营均由陸軍合編，二营管帶为張葆初，三营管帶为林修梅。五月間，鍾穎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鍾走后一个月，朱庆瀾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瀾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虛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頗融洽。赵督打算扩編新軍为一鎮，交朱筹划。朱問計于我，我說：“由协扩編为鎮，要解决五个問題：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設立講武堂以訓練干部；其三为購買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購馬匹。除第一項属于国防，須經我們拟定后呈請軍諮府核定外，其他四項，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鎮。”朱以为是，屬我草拟計劃，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購買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練公所总參議黃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楊瑾、曾广开为隨員。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經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

意担負起来。

这年十一月，我們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統制張彪、协統黎元洪。我們在武汉三鎮，参观了兵工厂、紡紗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訓練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地所少见。协統王得胜、刘韞玉，統帶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們作了詳細說明。与这些高級軍官接触，給我一个印象：我認为他們都是循規蹈矩、怕惹是非的人，一旦軍隊有事，他們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間，我特別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經過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濃厚，許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軍，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蔣翊武等組織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員如李六如、楊王鵬、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楊瑾与蔣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楊之介，得与蔣見面。我們两人談話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問題。翊武說：

“在湖北一鎮与一混成协的新軍中，有許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偵探密布，我們文学社未便在他們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們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謂只要軍隊訓練成熟而又为我們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們的行动綱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說：“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譚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組織，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見极表贊同。接着他又問我：“你看革命何时可以成功？”我說：“三年五載不为多，不过不能专就湖北一

省的情形来下判断。因为在湖北，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快的。且主义已渗透到了军队下层，只要人心不死，成功是会很快的。”翊武深以为然。我们相约各自努力而别。

我们一行三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一九一〇年的新年，听说同盟会正竭力策动广州新军起义，倪映典率领新军进攻省城，已战败阵亡。消息本不好，但这一次究竟是军队革命起义的开端，所以闻之也很兴奋。我这次到沪，虽为购械而来，不过更重要的还在留心物色革命人才，其中尤以物色联络员为最。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散步，得遇上年同船入川的但懋辛。此人精悍明敏，最适宜做联络工作。他这时正在中国公学教体操，彼此来往颇密，因将我的打算同他商量，他同意回川。我当即电请朱庆澜转请赵督优予录用，复电照准。至于购械，经过调查，决定向上海制造局定购七生五管退山炮，向泰来洋行定购马克沁机关枪，向日本太平洋洋行定购工兵器材，其他马鞍、皮带、服装等军用品，也同有关洋行签定了合同，定期交货。

我在沪任务完成之后，又抽空到南京一趟。南京陆军第九镇成立在湖北第八镇之后。第九镇的高级长官，多半是日本留学生，个个烜赫有名，在训练军队方面，形式上模仿日本的一套，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不过从前赵声等人对革命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坏，所以革命思想已深入到中下级军官的头脑中。但自一九〇七年端方屠杀了革命党杨卓林等人，逐走了军队将领赵声、柏文蔚、冷遹以来，禁网森严，致使军队中一般官长对革命工作多采取过于稳健的态度，惟革命潜伏力量仍然不小。好在南京离上海很近，将来南京一旦有事，是可以得到上海方面

的支援的。这就是我在南京期間經過与各方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不两天，我回到了上海。

四月間，在沪購械事务已告結束，便命楊瑾、曾广开先行返川，我个人告假一个月，回湘省亲。路过长沙，与文斐見面，交換了彼此所知道的情况。其时长沙搶米風潮剛好結束，巡撫岑春蓂、藩台庄廣良受到撤职处分，劣紳王先謙、叶德輝、楊汎、孔宪敦也受到严厉处分。我听到不少奇聞和新詩，都是描繪統治者的腐朽无能与老百姓挺而走險反抗政府的情形的，写得有声有色，奇趣横生。我認為，这次搶米風潮，乃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事前既无組織又无訓練，但仍然收到了同革命不相上下的效果，不能說不是一件十分可喜的現象。“万里云程初发軔”，革命前途，大可乐觀。

我在醴陵老家住了半个月，于六月間回到成都，仍供原职四川陸軍扩大为鎮的准备工作已完毕，估計十二月可以成立为鎮。因再与姜登选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四川情况，認為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問題在于加强我們的工作。談話中，我把这次出川考察的情形告姜，大意是：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在日益发展，长沙搶米風潮尽管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但足以說明革命条件业已成熟。长江下游各省也有进展，上海为下游各省的中心，同盟会已派人在沪主持。今年广州起义虽告失敗，但影响甚大，并且尚在再接再厉的奋斗中。四川居长江上游，应与滇、黔聯絡一气。留日云南同学大多参加了同盟会，这是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两湖对軍隊宣傳主义、組織力量的工作做得好，特別着重中下級官长，尤其是士兵，比四川側重軍隊中上級要好得多，我們應該向两湖学习。我这次在沪遇見但懋辛，四川会党

最多，已約但回川聯絡會黨。姜登選听了我的汇报，覺得分析恰当，因而增加了大家对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一九一〇年冬，四川陸軍第十七鎮正式成立，統制为朱庆瀾，我任正參謀官，兩位步兵協統由五十五、五十六兩標統帶施承志、陳德都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統帶叫叶荃，是同盟會會員，与炮兵統帶、工兵管帶一起，均同我們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選沒有升任为步兵統帶，是一缺点。过了年，即一九一一年正月間，接但懋辛來信，大意是，“近得异人傳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无法分身回州，有負盛意”等語。这是暗語，不久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們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聯絡工作。

四月間，川督赵尔巽調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憤填膺；复有鐵路国有風潮，川、粵、湘、鄂四省人民紛紛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請清政府收回成命。閏六月中，接家電，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請假回籍奔喪，把我担負的同盟會的工作交給姜登選接办。我于閏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瀾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詢。我因簡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紳反对鐵路国有的風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鎮新軍是为捍卫国家而設的，以不介入这次風潮为好。我聞新督性情急躁，統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搶米暴动，岑春蓂、庄廣良受到撤职处分，連新軍協統楊晋也牽連受累，可为前車之鉴。此次風潮远远超过长沙搶米暴动，希望統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

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請与他商量。”朱頗首肯，互道珍重而別。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紛紛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說：“自广州起义失敗后，黃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組織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聯絡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說：“这个組織极为重要。我們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統一計劃，徒然使工作受到損失。現在有了这个組織，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談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鐵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預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勸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別。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接朱庆瀾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員，須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見了文斐。他說：“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組織了共进会，对新軍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說：“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認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縱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軍隊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視。我現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贊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蔣翊武，沒有碰到。十八日乘車赴京。十九日車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

即南下，參加革命，以遂平生之願。時京漢路已停止客運，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條路。其間因子楷得病，楷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輪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貨上貨，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從京至滬，沿途所見，截然不同。京津兩地，熙來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則革命空氣十分濃厚，尤以工、學、商三界表現最為熱烈，令人興奮。計自武昌首義，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獨立，不出一月，全國即有七處起義，聲勢之壯，為前所未有。

在滬得知黃興已于月初從港經滬轉赴武漢。我與程子楷商量，決定同赴武漢。同路還有鄧希禹、黃子偉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願意棄職從軍，真是難能可貴。我們一行四人，于十三日從滬乘輪赴武昌，輪船准期到達漢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們雇了民船登陸，面見洪山防守司令，說明我們是隨黃興來武漢助戰的。防守司令立即寫了介紹信，讓我們進城。這天下午，下了一場秋雨，泥濘載道，我們冒雨步行三十里，到了武昌，城門緊閉，守城士兵驗看介紹信，才放我們進城。城內人人精神煥發，意氣軒昂，確有一番革命新氣象。又見市上間有青年，身着青緞武士袍，頭戴青緞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紅絨花，足穿一雙青緞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樣打扮，大搖大擺，往來市上。我想，這大概是“還我漢家衣冠”的意思吧！

黃興得悉我們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桂良前來，把我們招待到客棧住宿，并表示歡迎我們參加漢陽戰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桂良帶路，由鮎魚套過江，到了漢陽昭忠祠總司令部。克強見我們來了，十分高興。我們談論了當時兩軍對峙的

情形，得知湖北陸軍自起義後，破壞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帶以上官長，由於士兵不服，多已離開軍隊；因此，漢陽軍隊雖有三協和一標步兵，但由於統兵官不夠，或者統兵官軍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顯得有些單薄。不過士兵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氣尚好。至於敵方，此時業已起用袁世凱，並派馮國璋率軍兩鎮南下，與我作戰；惟山西、陝西先後獨立，清廷在在需要設防，所以除馮部兩鎮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難。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獨立，十五日蘇、浙宣布獨立後，為張勳所竊踞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蘇、浙、滬合軍進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見漢陽戰役，關係至巨，如果一戰而勝，則革命形勢即可穩定。

以上就是當時的基本情況，是這次見到克強同大家談話後所總結出來的。克強並說：“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軍四十九標和巡防營數營援鄂，我們革命聲威益振。”言下對戰局殊為樂觀。當時談話在座的，我記得有譚人鳳、參謀長李書城、副參謀長吳兆麟和同學曾繼梧等。譚白髮皤皤，語言耿直，給人印象最深。總司令部組織異常簡單。克強留我們吃便飯，飯後繼續談話。克強說：“湖南關係甚大，在焦、陳（作新）遭人暗算之後，問題頗多，最好我們有同志前往聯絡，共策進行。漢陽戰事，我已派曾繼梧指揮炮兵團，頗云來得及時，就請你幫助鳳崗（繼梧字）。”我說：“不論什麼工作，只要對革命有利，我們都是應該做的。鳳崗是我們的同志，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好。”談至此，即辭出。

從總司令部出來，我與繼梧隨即親至龜山下選一古廟作為指揮部，並委派鄧希禹、黃子偉任秘書。接着又上龜山察看炮